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回眸、反思与展望

——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

李 焯 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是中国乡村实践史与学术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其思想理论亦是值得后辈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文化、制度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框架,可以被用来梳理、比较不同乡建思想的逻辑与差异。研究表明:三位先生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包含了“文化失调、制度失范与主体失能”三重归因机制;三位先生分别为中国乡村发展,制定了“礼俗重建、生计重建与新民重建”三条取径策略。近代乡建思想的历史局限体现为可能的文化等级论倾向以及对乡村社会结构二重性的忽视。其当代价值的实现,需要研究者继承“整体性思维”的学术品格,重拾关于“文化”与“人心”的学术关切,并建构“超越结构/能动二元对立”的“过程社会学”分析范式。

【关键词】乡村建设;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理论反思;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2-0122-14

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Liang Shu-ming, Yan Yang-chu and Fei Xiao-tong

LI Yang LIU Zu-y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Liang Shu-ming, Yan Yang-chu and Fei Xiao-tong are the key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ur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ought. Their thoughts and theories are also important historical heritages worthy of cherishing by future generations. Their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s can b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culture, system and subject". Their analysis of rural problems in China includes a triple attribution mechanism with "cultural imbalance, institutional anomie and subject disability" as the main content. They formulated thre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iquette and custom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peopl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velihood.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modern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are reflected in the possible tendency of cultural hierarchy and the neglect of the duality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To realiz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odern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researchers need to inherit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holistic thinking",

【收稿日期】2021-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中‘乡村技术赋能’研究”(19BGL15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基于‘制度-技术’互构论的过渡型社区智慧治理研究”(2020M671512);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乡村振兴语境下‘村改居’社区智慧治理研究”(2019K079)

【作者简介】李焯(1988-),男,管理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社会发展史、乡村技术治理;刘祖云(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技术治理。

regain the academic concern about "culture" and "thought", and construct a new academic paradigm of "beyo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structure/activism".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Fei Xiao-tong; Liang Shu-ming; Yan Yang-chu; theoretical reflection; contemporary value

引言

乡村建设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任重而道远。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并将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鉴往知来,当代乡村建设问题的深刻认知及其化解,离不开对乡村实践史的回顾与梳理,更离不开对前人探索经验的继承与超越。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兴起的一场由知识分子参与的乡村运动,被视为百年乡村建设的发端。其中,梁漱溟、晏阳初与费孝通是三位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他们的近代乡村建设思想,无论是在社会发展史上,还是在学术思想史上,都是值得后辈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近年来,学界关于三位先生的学术讨论也持续升温^①。一方面,研究者认为三位先生的乡建思想存在基本的共识——都认为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以牺牲乡村为代价,都主张乡村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都倡导要激活农民与农村的内生动力。但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从各自的视角探讨了三人不同的社会关切——晏阳初对中国农民的主体诊断及其乡村平民教育策略^②,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③及其以乡带城、以农促工、以礼治国的乡村建设方略^④,以及费孝通针对农民生计、工业下乡、区域发展、文化自觉等问题的深刻论述^⑤。

整体而言,有关近代中国乡建思想的学术研究在四个方面进展良好:一是能较为精准地把握近代乡建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核心观点;二是能对近代先贤的理论主张保持审慎的解读与反思;三是能敏锐地洞察并积极地挖掘近代乡建思想的当代价值;四是能通过比较分析、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呈现乡建思想的理论精髓。当然,该领域依然存在可供拓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在于,需要建立整体性的审视框架。既有研究大都从自身独特的视角切入——文化的、农政的、制度的、生活的、伦理的或主体性的——来对近代乡建思想进行呈现与分析。这一聚焦方式在追求理论深度与力度的同时,却也压缩了学术对话乃至普适性理论建构的空间。缺乏整体图景与知识更新,研究者便无法精准地实现对自身议题的定位与定向,也就无法顺利地建立有价值的“学术生态位”。所谓的新发现,或是对既有成果的转述,又或仅仅是对既有研究结论的补充论证。即便幸运地为知识生产新添了一两个创新点,也难以对衍生性知识进行拓展与推进。事实上,乡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只有从系统性的视角出发,才能洞悉乡建思想体系内部各理论主张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更有利于将不同思想家的理论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全方位的对标分析。

对此,本文力图完成以下三方面的论述:其一,建构审视乡村社会的整体性框架;其二,依托此框架

① 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高质量研究不断涌现,代表性成果包括赵旭东、周飞舟、李友梅、刘亚秋、刘能、叶敬忠、周晓虹、王铭铭、杨清媚、陆益龙、田毅鹏、黄志辉、丁元竹、郭占锋、张浩、闻翔、方李莉、陈占江等学者的研究。

② 王建民:《平民教育与文化自觉——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启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柴文华、赵菲菲:《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中西文化观》,《江淮论坛》2019年第5期。

④ 聂石重:《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向度与社会基础》,《兰州学刊》2021年第5期。

⑤ 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2期;赵旭东等:《生态到心态的转向——一种基于费孝通晚年文化观的再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刘能:《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和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对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的近代乡建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比较;其三,总结并深入讨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价值。

一、文化、制度与主体:审视乡村的三维框架

个体改造社会的行为,会受到社会认识论的深刻影响,其体现为个体行为会在某种特定观念的支配下被合理化。同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思想者认识社会的进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人类历史的基础、演化、动力、方式和归宿的基本立场,也决定了其对社会基本问题的归因机制及策略选择^①。在社会认识论的不同路径中,“结构中心论”和“能动中心论”展现了两种对立分殊的态度——类似的话语模式还有支配与转换、社会与个体、客体与主体等。虽然表述方式存在差异,但其核心立场都指向社会学理论中一对经典的范式矛盾——“结构功能主义”与“解释社会学”。前者的认知模式以“结构”的优先性为出发点,强调宏大而严谨的理论建构,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特征;相反,后者以“主体能动性”为逻辑起点,将研究重心至于主体因素以及主体实践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效应之上^②。换言之,结构功能主义倾向于从“宏观/中观视角”来认知社会,将社会视作一个具备自身运行规则和承担社会资源分配功能的实体;而解释社会学则否认文化、制度或组织结构的优先性,而仅仅将其视作工具或手段,并倾向于从“微观视角”探究个体的内在能力。据此,从社会研究的“结构/能动”二分框架出发,本文认为,研究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认知活动一般会在三个层面展开——文化、制度与主体。

其一,从宏观层面看,乡村研究的文化分析至关重要。文化的定义是多维的,本文将之理解为“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全部生活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③。事实上,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学者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样的社会认知模式,并不局限于对某种文化现象的表层分析,而是将研究旨趣定位在检视掩藏于文化结构背后的深层逻辑与法则。在文化学者看来,只有与文化保持“零距离”,才能真正明了文化对于实践的普遍编码意义。总之,必须将文化纳入学术的视野,必须将文化理解为人类行为与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二,从中观层面看,乡村研究的制度分析同样不可或缺。制度作为个体实践的中层规则或模式,与文化价值体系密切关联——制度是文化的单位^④。因此,制度与文化在“结构层面”具有相融合性的特征。但是,二者实际上又分属于不同的范畴。文化本身不是制度,文化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因而是体现特殊性的^⑤。它是在时空绵延中不断沉淀的能够标识民族特性、捍卫民族身份、建构民族认同的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制度更容易被选择、改造、借鉴、模仿、移植或者复制,如民主投票制度、证券交易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等,其可以相对顺利地运行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或社会情境之中,即具备了一般性特征。也因此,相较于外延更广的宏观文化分析,本文选择将制度分析视作一种中观视角,其核心关切在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或社会组织结构等中观要素。

其三,从微观层面看,从主体的视角开展乡村研究也正在不断地被研究者强调。这一视角更关注主体的能动性与反思性,主张舍弃一切所谓的无可置疑、无可争辩的正统共识,也不再将人类实践纯粹地视作社会结构的产物。遵循主体范式的研究者在分析和理解主体实践时,会选择与普通行动者保持同

①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②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第81页。

③ 张小军:《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④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⑤ 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

等的地位,共享同等的资源,并从普通行动者的“心理动机”或“日常知识”出发来考察复杂多变的行动策略^①。具体而言,其需要进一步关注三个问题:主体行动所围绕的根本利益目标,主体改造物质世界的动态过程,以及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

至此,本文拟选择运用“文化—制度—主体”的整体性框架,来全面梳理、比较近代乡村建设思想中不同的归因机制与路径选择。需要进一步指出,理解乡村社会的构成与运作逻辑,虽然可以在“文化、制度与主体”的三分框架中进行,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其对应的“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完全地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事实上,在“结构二重性”的立场中,文化、制度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所谓社会结构并不能被视作一种物理性的存在,相反,它需要被理解作为一种主体的记忆痕迹,是以主体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认知能力为基础的。它不是外在于主体的东西,而是内化于主体并通过主体实践被表征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原则。更关键的是,从动态的视角来看,主体实践在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同时,也再生产着社会结构。随着主体实践的不断推展,那些在时空的延展中不断沉淀下来的结构性原则即为制度^②,而那些最稳定的、最根深蒂固的、最能够标识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结构性原则即为文化。总之,“结构—行动”互构论是本文在建构“文化、制度主体”三分框架时秉持的认识论立场,这一动态勾连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梳理乡村社会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时,还能在整体上把握各个部分之间蕴含的内在逻辑关联。

二、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三重归因

(一)近代中国乡村的“文化失调”

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皆在各自的乡建思想中论述过近代中国的文化症结。其中,文化失调是三位先生对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一致性诊断。

首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乡村社会的特色就在于“文化”^③。他力图融启蒙与救亡为一体,通过乡村建设将民族自救与创造新的人类文化两项任务“毕其功于一役”^④。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幼稚形态未除”的“早熟文化”。因“实在传之太久”而“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中国文化所欠缺的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优长,即团体生活与科学技术^⑤。当这一老衰且幼稚的古老文化,遭遇以“奋斗”“意欲向前”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化,“何能不手忙脚乱,头晕眼花?何能不东撞西突,胡跑乱钻?”清末以来的中国历次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企图在中国创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国家,却忽视了资本主义背后其实蕴含着从“人生态度”到“经济基础”再到“政治文明”的一气呵成的发生逻辑。相较而言,中国社会缺乏滋养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现代性精神气质的文化土壤。因此,梁漱溟强调,乡村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失调,乡村改造的底层逻辑就是文化改造。当然,他在总体上否定西化论的——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

其次,晏阳初也指出,中国农村的凋敝状况是一种文化失调。“固有文化既已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并且,就文化的变迁趋向而言,“新文化已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积极明显的影响,然而传统文化的积力仍然把每个中国人牵引着不容易往前走。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ion)的必要”^⑥。可以看出,如果说梁

①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第60页。

②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第73页。

③ 罗志田:《文化的眼光:梁漱溟认识取向的特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④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5—67页。

⑥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5页。

漱溟是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主张“中体西用”，那么晏阳初则实际上是在倡导一个完全相反的文化体用结构，即更侧重于中西对比意义上借助现代西方的他者来映照对中国文化特性的认知^①。作为对美国生活经验有着深切体悟的留洋知识分子，晏阳初是怀揣着基督徒般的历史使命来审视中国近代乡村的“文化危机”。他所指认的乡村文化失调，是在对近代中国整个时代精神的质疑和忧虑中得出的结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在诊断中国乡村问题时，几乎彻底抛弃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并表现出对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的深切认同。

最后，费孝通同样给出了近代中国乡村遭遇文化失调的论断。他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②在“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易替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无餍求得”的文化观与传统东方“寡欲持中”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近代中国乡民的日常生活由此产生了“相似的裂痕”，这体现在个体心理上就是一种“相似的烦闷与不安”，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文化失调。需要指出，费孝通认为，“不同文化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特定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③。这一“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观，将文化视作“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文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功能在于“是否能达到求生的目的”^④。一旦遭遇处境的变化，文化的部分价值就会失去效用，进而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当然也就不再涉及价值问题。由此可见，区别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文化等级论”，费孝通对文化本身并没有先在的、预设的价值判断，也没有对所谓的“文化特性”进行总体性的归纳。因为，他的逻辑起点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他曾经这样说道，“即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这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是已经走了”^⑤，而“人类创造文化为的是要增进他们生活的价值，他们并不会以维持文化为目的而牺牲生活”^⑥。

（二）近代中国乡村的“制度失范”

转至中观视角，就制度层面的问题意识而言，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回应的是“五四”时期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命题：帝制皇权解体后，建设民治政体的民情基础是什么^⑦？相对于文化归因，这样的制度分析主要指向以乡村经济、政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层结构”。其中，梁漱溟和晏阳初对近代中国乡村制度诸问题，都曾有过深刻的洞见。梁漱溟认为，文化失调的表征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⑧。作为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中国盲目地仿效西方制度，非但无法救中国，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秩序的混乱。其在经济上体现为手工业与农业的相继衰败，而在政治上更呈现出政权分散、军阀割据、武力横行、政府腐败等一系列病象^⑨。同样，晏阳初的乡建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代中国的制度失范问题。他赞同梁漱溟，认为大部分国人有着重“上层政治”而轻“下层政治”的倾向，忽视了县政与基层农村的切肤关系，同时也忽视了作为中国政治基础的农村政治。事实上，在那样的时代，农民对中央最真切的态度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更糟的是，连年的天灾匪祸使得整个中国农村，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显得“到处破碎颠连，生机垂绝”^⑩。

① 李友梅、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②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第1页。

③ 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④ 费孝通：《乡土重建》，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98页。

⑤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12页。

⑥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119页。

⑦ 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学海》2017年第5期。

⑧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5页。

⑨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311-317页。

⑩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245、246页。

需要指出,虽然两位先生皆有论及乡村制度问题,但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终极关怀。在梁漱溟看来,“制度依赖于习惯,而新的政治习惯的建立,必以人生态度的改变为前提;人生态度的改变,则以文化问题的解决为前提”^①。因此,他的制度分析,仅是“文化→心态→习惯→制度”这一整条文化理论进路的一个环节;同时,晏阳初的乡建理论也主要聚焦于平民教育,其将乡村建设的取胜之匙锁定在“人”的问题上,更关注导致中国落后的主体性因素。

相较而言,立志于从社会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青年费孝通,更关注制度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忽视制度背景,乡村问题的认识必将行之不远。由此,他选择将农民生计、家庭婚姻、日常生活、社区组织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作为其对中国乡村的核心关切,并通过“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考察制度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制度与社会系统的整体匹配情况。他开创性地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从己向外推已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②。在他看来,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父、母、子”的三角结构^③。并且,在社区、地方政府乃至更广泛的组织内部,也都实行着与“家庭制度”几乎相同的运行准则。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会利用孝、悌、忠、信等私人的亲属伦常去组合社群,以维护自身在乡村的财产与权威。然而,随着现代性对传统中国的强势入侵,乡村社会不同主体的境遇与角色发生了改变,费孝通称之为一种“社会腐蚀”过程:绅士阶层不断寻求摆脱生产劳动,他们要么在乡村掠夺成性、难以驯服,形成新的“寄生阶级”,要么在西方文化思维和现代生活样式的浸润下,主动切断与家乡的联系,成为乡村的“背离者”^④。与此同时,真正的穷人也会因不堪忍受土豪劣绅的盘剥与压榨,踏上革命的道路。所谓的乡土社会结构,无论是在主体的构成、角色还是在主体间的伦常关系上,都失去了平衡。近代中国乡村遭遇的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严重骚乱。

进而言之,一方面,费孝通对乡村经济结构的分析首先是从农民生计问题开始的。他在其成名著作《江村经济》中,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进行了细致考察与描述,旨在阐明地方经济结构与地理环境及乡村社区的结构关系。在开弦弓村,他看到了近代中国乡村“工农相辅”的生计模式,看到了种植水稻、油菜、桑树、小麦,以及从事渔业、畜牧业等丰富多样的农业生产策略;同时,他也看到了现代工业强势冲击下传统乡村手工业的衰败与挣扎,看到了农民因生计结构的失衡而身陷金融借贷体系难以自拔的窘境,看到了不在地主与佃农之间愈发紧张的金融关系,以及日渐疏离的社会交往与情感联结^⑤。更重要的是,他在更深的层次洞悉了上述所有经济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与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在乡村政治制度上,费孝通认为,近代中国基层乡村的行政体制正日渐僵化。随着超越地方性的公共事务日渐复杂,维持有权无能的中央政府已然不合时宜。国家权力不断扩展,保甲制度将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筑到了每家门前,既突破了先前“国家无为主义”建构的精神防线,也冲破了“乡绅自治”的制度防线。然而,保甲制度所划定的政治单位与实际乡土社会的生活单位并不匹配,官民两套治理制度在基层乡村开始纠缠。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接受原有的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旧的机构却失去了合法地位,无从正式活动。中央职能不断强化的同时,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却被堵住了,乡村自治单位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⑥。

(三)近代中国乡村的“主体失能”

除了文化与制度,三位先生认识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还存有一条“由内而外”的主体路径,即追问近

①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③ 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5页。

④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91-102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69页。

代中国乡村衰落的主体因素、思维因素、心理因素乃至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

第一,晏阳初坚信,近代中国的生死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虽然土地、主权都是立国的要素,但是“人”是要素的要素。没有人,土地何所用?主权何所寄?^①近代中国之所以屡屡遭受压迫与欺凌,其根源就在于国民的愚昧、贫穷、体弱与自私。他说:“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的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更叫中国整个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②他观察到,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波诡云谲,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大都“淡漠旁观,惊骇躲避,或是抑郁烦闷”,整个民族都丧失了基本的团结力与凝聚力。可见,在晏阳初看来,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部分国人缺乏有效应对的主体能力,这样的“主体失能”,既体现在肢体肉身层面,也体现在智识与德行层面。

第二,梁漱溟同样关注国人的主体性问题。但是区别于晏阳初的“人格危机论”,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主体性归因,更多地指向中西方人之间的“精神不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乱,所以没办法,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神情态度与西洋人的神情态度得不到调和,彼此之间,很有些距离,找不出一个可以彼此沟通之点”^③。在这里,所谓的神情态度,即指一个人的“动念之缘起”“心思之所指”。梁漱溟进一步指出,中西精神不合者有四:其一,西洋人处处向外争求,而中国人各自消极节制,彼此调和妥协;其二,西方人好“动”,东方人喜“静”,西方人“血脉愤兴、进力活跃”,东方人“温恭撙节,顺序就理”;其三,西方人彼此牵掣,彼此防范,而东方人心态平坦,心存善意;其四,归根结底可以说,西方人尚义理,而东方人尚情谊^④。并且,在价值判断上,梁漱溟并不认为所谓的西洋精神具备了相对于中国儒家精神的优先性,恰恰相反,他在承认西洋精神积极亢奋、昂扬向上的同时,却也指认了其劣势之处,即相对与“中国精神之深厚”而言的一种掩藏不住的暴力与粗浅。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感受到西洋刺激的同时,实则意味着“每一度地向上皆是更一度引入向下去,继续不断地向上正即是继续不断地下降”^⑤。由此,造成了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一种矛盾,而国家衰败的原因即在于一种主体的“精神不合”。

第三,早期的费孝通对中国乡村问题的主体性归因虽然并不显著,但亦有所论及。比如,他在描述中国传统绅士时认为,他们是好斗的、独立的、自尊的、保守的,同时也是练达的、幽默的、闲适的、精致的。正是总体上缺乏经济与政治积极性的人格特征,才使得传统绅士阶层不愿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改造。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又使得新一代绅士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化,一部分人变得投机、轻率、拜金且无所顾忌,另一部分人则依然延续着父辈的传统,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撕裂程度^⑥。与此同时,费孝通并不认同晏阳初对中国农民的“诊断”,与之相反,他对近代中国农民的主体性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宽容与理解。他不同意将中国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乡村问题,更不同意单向度地把中国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农民。他在评论中指出,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所展露出的“传教精神”,本质上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而后去教育别人的“不是”^⑦。这种以正克邪、居高临下的强者姿态,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农民。所谓的“农民问题”可能仅仅是一种来自他者想象的问题,而非农民最核心、最紧要的问题。也因此,费孝通才主张应当首先从物质层面或日常生活层面来认知、体悟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

①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246页。

②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216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06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07-125页。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41页。

⑥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122、126-128页。

⑦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三、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三条进路

在给出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时,梁漱溟、费孝通与晏阳初同样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作为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的出路在于通过乡村组织重建新文化新礼俗,费孝通强调中国乡村的首要问题在于通过复兴乡村工业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①,而晏阳初则将农民主体性的重塑以及由此展开的平民教育作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根本出路。三位先生的路径选择之所以会在价值层面呈现差异,并在社会系统的各个操作层面有所侧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认知,脱胎于不同的生命个体的成长史,以及各自所处的不同的国家历史情境。三位先生的思想形成过程,实则寄寓着各自前期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浓缩着不同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社会记忆或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影响^②。

(一)文化进路:梁漱溟的乡村“礼俗”重建

整体而言,梁漱溟的乡建主张并非聚焦于社会制度或国民主体性的重建,而是将关注的目光置于“社会文化的调整与改良”之上,他的思想主旨是“希求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③,进而实现“文化建国”的理想。

首先,梁漱溟指出,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组织构成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即传统中国是一个“互相以对方为重”且“职业分立,各奔前程”的社会^④。即便乡村中存在着地主,他们对土地的垄断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有那些占有自耕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才是乡村社会的主要群体。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明显对立分化的阶级,即便是不同阶级之间也存有上下流转的通道。故而,中国乡村“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没有革命的对象”,中国乡村问题需要依靠自觉的生发于个体思维的理性来解决,而不能像欧洲人那样“以斗争解决”^⑤。

其次,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是化解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原因是,无“团体组织”的精神则教育、政治、经济等制度皆无法合理建立起来。考虑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形著于社会礼俗,梁漱溟主张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应遵循社会演成的习俗——“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要如此”。只不过,乡村的复兴需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亦即建设“新的礼俗”。在他的理想中,“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他感觉到乡约有补充改造之必要,乡约制度加以补充改造。使大家以团体为重,从积极下手,才能挽救当前的难关,弥补固有的缺乏”^⑥。因此,梁漱溟号召“乡村运动者要联成一大文化运动团体系统,由此系统领导推进大社会”,即以“文化改造”为基础重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

① 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② 费孝通于1910年出生于苏南的一个士绅家庭,其姐姐费达生作为中国蚕丝工业改革的先驱,对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费孝通因此很早就具备了将中国乡村经济纳入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中加以考量的视野。此外,其认识论路径的形成,还需归功于科学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以及对中国乡村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相较而言,1893年出生于北京的新儒学大师梁漱溟,则相对缺乏基层的实践经历,这让他认识乡村的视角显得较为宏观。他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君主立宪”曾经一度是其所推崇的制度理想,但是军阀割据时期的政治乱象令他大失所望,这让他深刻意识到文化惯习的重要性。此外,晏阳初的乡村新民重建主张,实际上是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观念的影响,正是长期的异国留学经历以及在法国华人劳工界成功的识字教育经验,让其深刻意识到了平民教育的关键作用。

③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06页。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46页。

⑥ 闻翔:《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再次,所谓的“新文化”“新礼俗”抑或“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具体如何建构?梁漱溟认为,其一,从发生逻辑来看,这样的新礼俗不会是自上而下的创制秩序,而只能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是在理性思维的促动下“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路走出来的”秩序。其二,从改造的基本方略来看,新礼俗的重建需要将“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进行调和与沟通。对此,梁漱溟尝试在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的传统五伦中,加入“团体/分子”这一新的伦理维度,旨在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观念^①。此间,团体与个人需要在“相对的伦理主义”理念下维持二者的互相尊重,用以调和“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分际。其三,从具体的实施策略来看,梁漱溟主张要在继承传统乡约的同时对其进行补充改造。作为由乡民自己发动的“伦理情谊组织”,乡约的基本纲领在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具体而言,要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要鼓励“人生的向上,志气的提振”,要在乡约的施行中侧重“乡与乡的联络,而渐及于县与县、省与省的联络,要普遍地去联络,相往来,通消息”,与此同时,还需要尽量规避“政治力量的推行”,而选择从“私人的提倡或社会团体的提倡”出发,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行乡约^②。以上一系列宗旨也使得补充重建之后乡约组织能够兼顾“伦理情谊”与“人生向上”的双重目标。

最后,梁漱溟强调,乡约虽好,但仍然只是一种精神,是空虚的,有待于充实。乡村文化建构中的“中体西用”,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在实践中,将新的秩序在根本上调和成一个社会事实:其一,可以通过社学(教育机关)、社仓(经济机关)与保甲(自治自卫—政治机关)进一步将新的乡约精神落地^③。其二,新的乡约秩序在实践中需要坚守其运行的底线与标准。虽然乡村社会的一事之从违,行之于团体生活之中,人情以为安,表面上也无所拘定,但其内里必须存有不可轻易变更的准则^④。其三,更重要的是,一套规则系统得以成立的条件在于“是否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承认与履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只有当农民真正地将新的乡约礼俗,视作乡村社会运行最普适的依据的时候,这样的新秩序才能体现出一种“真实性”。再换言之,只有当这些准则成为大家相喻而共守的社会知识,并在时空的绵延中沉淀出新的民情习惯法时,所谓的“新礼俗”才算真正成立。

(二)主体进路:晏阳初的乡村“新民”重建

针对近代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的四大精神症候,晏阳初主张通过平民教育重塑中国农村之“新民”。这样的“新民”并不是从西方引介或抄袭得来,而是从中华民族“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⑤。所谓“平民教育”,是说同是圆颅方趾,同是平等的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其培育的对象主要是指“已过学龄时期而不识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男女”,其培育的目标是为了让“失学男女皆具有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是为了“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新组织”,是为了让贫困积弱的中国农民能够顺利地“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⑥。由此可见,晏阳初的乡建构想的核心目的就是“重塑农民的主体性”。他强调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培育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整个的人”,打造这样的“整个的人”须要依靠四种形式的教育。

其一,文艺教育。晏阳初认为,读书识字是人类共享的权利,而非读书人独有的专业。文字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媒介形式,承担着延伸人类思维的重要功能。“欲传播知识,须先传授文字;欲得知识,必须认识文字”^⑦。因此,乡村平民教育需以文字教育为出发点,需要从文学艺术着手培养人民文艺兴趣,需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77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01-204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99、200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53页。

⑤ 李友梅、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⑥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72页。

⑦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51页。

要增进科学头脑以解决“愚”的问题。其二,生计教育。为了进一步化解“贫”的问题,生计教育旨在培育农民的科学技术素养以及掌控经济环境变化的主体能力。具体措施有推行“乡村巡回生计训练”办法,推广农业科学指标的表征训练制度,改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其三,公民教育。乡村平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造合格的现代公民。一方面,要积极运用既存的社会基础培养民众的团结力与公共心,使农民的组织行动能遵循“忠实”与“效率”的双重逻辑;另一方面,要从基本的道德观念出发,培育农民的辨识力与正义感,使其具备判断公是公非的能力与自信。这既是必要的根本精神,亦是必要的道德训练。其四,卫生教育。一方面,施行乡村卫生教育,传授科学医药的相关常识,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建立乡村医疗卫生制度,改进医疗资源的分配结构,节省农民的医药费用,以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①。

总之,在晏阳初看来,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需要在根本上诉诸于乡村平民教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组织去私,以卫生去弱。因为,“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设新的社会结构”^②。如此,乡村建设才能依靠“人”的准备,走出一条新路。

(三)经济进路:费孝通的乡村“生计”重建

综上,梁漱溟的乡土礼俗重建方案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路径,无论其初衷如何,皆直指近代中国乡村的根本性问题——最深刻的文化因素以及最微妙的主体因素。但是,客观而言,以“文化”或“主体”为改造对象的乡建方案实则都是“消耗性的”。在人才、经费、环境、时间、思想等因素皆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对“文化”与“主体”进行改造,并不能解决最急迫、最紧要的阶段性问题——农民生计。过于宏大的理论构想可谓“其锋也利,其折也易”,最终也可能沦为献身理想的工具。在年轻的费孝通看来,“心”归根揭底是以“身”为前提的,人格培育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切不可倒因为果。无论倡导者将“文化礼俗”或“主体人格”渲染得多么意蕴高远,其都难以取代饮食男女在普通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由此,费孝通本着“自力更新的原则”从经济问题出发设计了一条“工业下乡与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首先,费孝通认为,重建乡土社会首先是要重建中国的城乡结构关系:一是要重建不在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在地主需要主动调整经济收入结构,向农民让渡经济收益,放弃以收租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二是要打通城市与乡村的空间结构,将城镇视作“农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副业和商业的起点”以及“连接农业和工商业的关键环节”,并将其打造成“生产社区”,进而以此重建城乡互助结构^③。

其次,费孝通指出,“恢复农村企业”是乡村重建的根本措施。这样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并非单纯地追求规模化的现代工业模式,而是要建设一种分散性的“乡土工业”。在他的逻辑中,工业发展的立足点并非其本身,而是为了将乡土工业发展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费孝通由衷地希望,那些曾经被现代工业冲散的乡土工业,能够重新成为中国乡村经济的重要构成,使其能够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截留部分意图脱离乡村到城市讨生活的人,进而保全乡村社会的人口基础。因此,这样的乡土工业需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农家可以在不放弃农业的同时参与工业;二是工业活动区域与乡村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三是工业所有权必须归属于实际的农民参与者;四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可以由农民自己供给;五是收益所得必须能最广泛地分配给农民^④。

再次,进一步考量社会结构或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费孝通认为,乡土工业实践需要与乡村合作组织相配合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合作性质的乡土工业模式保证了“生产者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了剥削成分”。费孝通在此间看到了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结构所蕴藏的巨大的社会保险力量。为此,他极力倡导在农村组建囊括金融借贷、技术推广、知识服务、利益分配等内容的乡村合作组织,旨在提增

①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146页。

②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217页。

③ 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2期。

④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137页。

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辅助乡土工业的振兴^①。

最后,费孝通从上述功能关系和系统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人文生态”的概念,即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②。也正是基于这种整体性的思路,费孝通在“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研中,逐渐提炼总结出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多元结构模式:“以工补农”的“苏南模式”,“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又或者是“区域联动发展”的“珠江模式”。可以说,费孝通一生的很长时间都在追寻制度变化的轨迹,从乡土工业追到小城镇,直到各种经济模式,为的是给农民找致富的出路。

总结与讨论

近代乡村建设运动至今已近百年的历史,当今的中国乡村建设也正跨越“脱贫攻坚”的历史节点,进入“全面振兴”的新阶段。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学界,都对处于第二个百年开端的乡村建设抱以高度的关切与期许。这既是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历史延续,也是一个充满思想碰撞、争鸣与和解的“知识建构”过程。在新的情势下带着新的问题重温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不禁让人感叹近代先贤极具现实意义的思想与智慧,其对于理解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总结:近代中国乡建思想的总体性呈现

本文遵循从文化到主体、从归因到路径的研究脉络,梳理了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中国近代乡建思想。研究表明,三位先生对近代中国乡村诸问题各自存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归因机制及实践路径(表1)。

首先,从价值论层面看,三位先生关于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殊。其中,梁漱溟与晏阳初同属“文化等级论者”,即认为不同文化的价值有高低,优劣的差别。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优先于西方文化,而晏阳初则对西方现代性文化有着更深切的认同。相反,费孝通反对文化等级论,其从社会人类学视角出发,主张文化分析的价值无涉。他认为文化无优劣之分,而只有“是否符合生活逻辑”的差别。其次,从认识论层面看,三位先生在认识近代中国乡村问题时,大致都做出了文化、制度与主体的三重归因分析。总结而言,问题根源有三:一是因东西文化的交锋而导致的“文化失

表 1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代表性思想的对照分析

对照维度	中西文化比较的价值基础	近代乡村问题的文化归因	近代乡村问题的主体归因	近代乡村问题的制度归因	近代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梁漱溟	文化等级论 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	老衰幼稚的古老文化遭遇意欲向前的西洋文化,必然会在对话中处于劣势。	精神不合论。东西方人难以精神沟通。西方人尚义理,东方人尚情谊。	手工业与农业的经济衰败,军阀割据、武力横行、政府腐败等政治病象。	乡村新礼俗重建。重礼治,轻法治。在传统礼俗伦理中加上“团体”的维度。
晏阳初	文化等级论 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失去其统裁力,而新文化又未建立起来,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	人格危机论。中国农民的四大精神症结——愚昧、贫穷、体弱与自私。	中国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经济与政治结构“到处破碎颠连,生机垂绝”。	乡村新民培育。以知识去愚,以生产去贫,以组织去私,以卫生去弱。
费孝通	价值中立 (人类学视角) 文化无优劣,文化具有对生活的功能性。	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即发生失调。	传统绅士缺乏经济与政治积极性的人格特征,使其不愿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改造。	现代工业对乡村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导致生计结构崩塌,乡村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双重失衡。	乡村生计重建。实施工业下乡,重建“工农相辅”的乡村工业,以及与之相位育的社会组织结构。

①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153-164页。

② 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2期。

调”,二是因西方现代性入侵导致的乡村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双重失序,三是掩藏在乡村建设实践背后的主体性问题。最后,在实践论层面看,三位先生又从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各有侧重地给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即梁漱溟强调乡村“新礼俗重建”,晏阳初强调乡村的“新民培育”,费孝通则更关注乡村的“生计重建”。

由此,我们可以将乡村建设研究中不同的理论立场、核心关切、焦点问题等,同时置于上述框架中进行对比分析。该整体性框架有助于促进乡村建设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对后续中国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反思:近代中国乡建思想的历史局限

近代中国乡建思想并非偶然生成,而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是建立在思想家各自的文化哲学基础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认知之上的。因此,即便再完美的理论也都存在历史局限性。近代先贤的乡建思想同样会因深植于理论内部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而遭遇批评与质疑。

一方面,从价值论层面看,梁漱溟的文化乡建路径就被认为夸大了儒家文化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高估了道德力量与人性之善,过于轻易地将制度的根基建立在超越物欲的人心之上。在对儒家文化的价值颂扬中,梁漱溟关于“儒、佛、西”的文化公式被认为是主观且笼统的,其也难以让人信服地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生长点。同时,晏阳初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诊断也被认为在文化价值观上出了问题。他将看似不合理的乡村现象视作一种社会病态加以批判,并以乌托邦的终极关怀来建构理想的社会模型。然而,乡村改造的进程并非一定遵循引领者的价值观而展开。归根结底,文化作为“社会互动围绕其发生的有序的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只有在生活中发挥功能时才是“活的”。因此,需要追问,对某种文化进行价值判断是否恰当?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伦理,都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或理论形态,并不能作为根本的“体”。所谓的道德伦理也都无关乎真理,而不过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内部流行的价值取向而已。诚如鲍德里亚所言,那些被认定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和功能都只能体现在阶层关系之中,一种价值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另一种价值的否定之上^①。

另一方面,相较于对近代乡建思想进行价值反思,本文更关注近代先贤关于乡村社会的认识论模式,即他们审视乡村的方式与路径是否存在进一步补正的空间。事实上,晏阳初用“问题模式”来认识中国乡村的做法被认为是如有疑问的。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来,社会问题取向的那一派根本就够不上一门“科学”,“就像在沙滩上采集贝壳一样,再多的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贝壳搜集都无法真正说明贝壳构成的共同性的结构特征”^②。与晏阳初类似,梁漱溟同样遵循以“乡村问题”为中心的论学方式,只不过他在文化精神与政治制度上有着更高的追求,也更强调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理解。相比而言,受过功能主义人类学系统训练的费孝通,其研究旨趣明显要高于“乡村问题”本身。他的乡村研究既能用较强的西学问题意识来把握社会实体的方方面面,也能从更现实的“制度与生活”出发认识乡土社会变迁的结构性条件。但也正因如此,费孝通对乡村文化的保守认识又使其过于倚重这些制度条件,而忽视了制度濡养人心的可能^③。直至晚年,他才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做出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重要反思。

至此,笔者认为,近代中国乡建思想的认识论缺陷在于,研究者缺乏勾连“结构”与“能动”的理论意图。尽管晏阳初强调平民教育对于“新民塑造”的重大意义,尽管梁漱溟曾深刻地意识到“社会组织构造”与“个体神情态度”的密切关系,尽管晚年的费孝通也积极地利用“文化自觉”“意会”“将心比心”等概

① 唐军、谢子龙:《移动互联时代的规训与区分——对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 闻翔:《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念,来论证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①。但从严格的社会理论视野来看,他们对主体性的关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充分。关键在于,这样的乡建思想并未真正建构起统合“文化”制度与“主体”的中层分析框架。我们要意识到,乡村实践主体始终处于学习使用物质工具和文化工具的情境之中,他们也会根据情境所带来的限制或机遇及时解决遭遇的问题^②。所谓的“文化自觉”,在社会互动的微观情境中,毋宁说是一种“规则自觉”与“情境自觉”,当传统、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因素都被压缩进同一个社会时空时,其规则是多元复合的,其情境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并不存在纯粹静态的外部结构或者孤立的内在意图性,文化礼俗与主体意欲皆无法被单独的还原或建构。这一特征,在日益复杂化、流动化、情境化、精细化、网络化、媒介化的当代社会中变得尤为显著。变化不再是个体遭遇的偶发事件,变化成了现代生活的内在属性。

(三)展望:近代中国乡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尽管近代乡村建设运动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近代先贤为中国乡村的思想改造、产业振兴、制度建设、文化传承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近代乡建思想留给后人的启迪不容遗忘。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接续前人“未尽的事业”,努力完成思想上的守正、转化与超越。

第一,继承“整体性思维”的学术品格。中国向来推崇有机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主张建构一种整体联结、因循传承、相容共生的文化或制度。因此,当代乡村研究的各个学科应当破除门户之见,杂取百家之长,将乡村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系统,并从整体性的视野来探究乡村社会各部分的功能及搭配。事实上,学术史并非一定是进步的历史。有的时候,后辈的研究无非是先贤思想的一连串脚注。越是身处高度分工化、精致化的社会,我们的知识生产就越是充满了各种机巧。在这样的时代中,学科是分化的,知识是割裂的,人们各说各话,画地为牢。相反,越是在朴素的、启蒙的年代,人们俯仰天地、胸怀丘壑,却越是可能孕育出横跨中西、纵贯古今的大视野与大智慧。

第二,重拾关于“文化”与“主体”的学术关切。从现实层面看,当代农民在物质占有上正不断丰裕,但却在精神生活中体验着一种反向过程——日子过好了,反而感觉更差了,物质生活更丰富了,却越来越陷入一种相对剥夺的情感困境之中。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困扰,成了现代性席卷下的农民、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愈发紧张的一对矛盾。从学术层面看,近现代的科学发端导致了唯物论盛行,也让乡村研究者不断漠视“文化”与“心灵”的价值,尤其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心灵治理传统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竟至断绝,研究者“物质性归因”的倾向较为明显,并尤其强调物质手段对于化解乡村问题的决定性作用。针对上述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倾向,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及其理论研究需要完成对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兼顾,不仅要关注经济、制度和组织,还要关注文化与主体。

第三,建构“超越结构/能动二元对立”的学术新范式。乡村研究中“结构分析”与“能动分析”的割裂局面,亟需一套可操作的中层分析框架,用以考察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形态。对此,“过程社会学”提供了建构乡村建设新理论的可能性,即开启对“社会互动”的基本讨论。在埃利亚斯看来,生活世界并非既定的实体,而是由个体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而成的现实,他将这样的“社会互动”称作“社会型构”(social configuration)^③。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变量,“型构”是指人们之间形成的、使彼此相互联系的互赖网络。其核心内涵指向三点:其一,型构在结构层面涉及社会的资源、规则或价值系统;其二,型构在实践层面会凸显于主体行动之中;其三,型构在整体层面需要被理解为“主体与结构互动互构的动态过程”。如此,现代乡村建设的发生过程即可以理解为一种建构现实的“社会互动”。考察乡村建设

① 刘亚秋:《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法]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张月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③ “social configuration”亦被译作“社会形态”。参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问题也就可以被转译为更为经验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描述乡村建设实践所生成的特定型构——资源、规则或情境——是什么？型构中的乡村建设实践行为包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需要以历时性的眼光审视乡村型构的发生进程，不同的乡村实践主体如何通过援引规则、动员资源，策略性地开展社会互动？主体的能动性何以影响乡村实践场域中某一型构的样态？历史中的某一乡村社会型构相比于当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等等。总之，以“型构”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过程社会学”范式，依靠对情境、规则、资源、策略、心理、动机等社会结构化要素的动态分析，能够良好地弥合“结构”与“能动”的紧张关系，其对于理解中国乡村建设的当下与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良木）

（上接第 121 页）

计划，甘肃大面积种烟的局面得到遏制，但是种烟的重点区域则转移到了位处甘肃的甘南地区。在交通不便、政令难及的甘南地区，各族民众连年种烟，位于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地区最为集中，群罍绽放。可见，甘南地区因禁烟而大面积种植鸦片，地方势力、回汉商人和藏民形成了种、运、售、吸鸦片烟毒的利益链条，给禁政推展带来了诸多困难。

禁烟政令层层下达至甘南地区后，地方官员联合党政军机关积极施行，成立禁烟组织、登记烟民、开展禁烟宣传、查缉和判处违法行为等。地方政教势力表面上参与禁政，实则包庇种烟、售烟，借机自肥。随着国民政府加大禁政力度和国家权力逐渐渗透至边疆地区，地方实力派的庇护之举有所收敛，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亲赴迭部铲烟，可是，不公平铲烟损害了部落民众的切身利益。部落藏民借机聚众抗铲，独立性增强，在“遵守”和“违抗”禁烟政令之间随意切换，连年种烟，使禁政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甘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有所式微，双方合作加强，保安司令部数次率队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或借势抗铲，或直接屈服，或武力不支后屈服，但因受种种限制和牵扰，禁政未竟全功。

国家政令在甘肃地区的推展和落实，地方民众是关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着各项政令得以落实的范围和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甘南地区推行禁政的过程中，地方民众逐渐加入，表明国家权力向甘南地区的渗透取得了一定成功，也表明地方实力派对国家权力渐趋遵服，而地方民众则遵违无常。这些变化的背后拥有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地方实力派从包庇种烟、借机自肥渐渐变为支持禁政、率部武力铲烟；部落民众既可在地方实力派庇护下种烟交款，也可在禁政严行下自觉铲烟、主动认罚，或具甘结、做承诺、不种烟，还可为坚持种烟、聚众抗铲。可见，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禁政难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地方治理困境的内在机制。地方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超过内地民众，成为地方治理必须面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将其权力触角深入基层，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地方治理体系，即使依靠具有临时性、流动性和嵌入性的武力行动，也无法完全、长期、有效地控制地方社会。地方民众的利益不可被忽视，但国民政府实施的地方治理又比较缺乏基层民众的深度支持与有效合作，所以各项政令的推展存有明显限度，很难真正落地生根。

〔致谢：论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委托项目（20@WTS003）支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李良木）